

## 香港并不止这样

狄安丽 (Anne Decortis)

如果慈善舞会是唯一可以筹得善款的方法，那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我很想朴实地尝试另一种方法，一种有意义的、能带来反省、能进入香港社会并从中展开的一种运动。

无国界医生 1988 年开始在香港工作，与联合国难民署、港英政府及多个志愿组织合作，为难民营和船民营的越南人提供医疗援助，直至 1998 年初全部越南难民和船民被妥善安置或遣返为止。

1994 年无国界医生在香港成立办事处，以宣扬无国界医生的理念、招募志愿救援人员及筹款，并逐步发展为无国界医生运动全球 19 个地区办事处的一员。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 2010 年派出志愿人员 122 人次参与海外救援行动。2010 年香港市民的捐款超过 2 亿 2 千万港元，支援了无国界医生在 41 个国家的救援工作。

2007 年，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获中国政府批准，成立广州代表处，主要推行传讯工作、招募前线志愿人员、物流供应，以及为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救援项目提供支援。

“你想也不用想！香港，这部只会制造金钱的机器，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，这被个人主义、利己主义充斥的社会……这儿哪会有人关心非洲或阿富汗的命运！”

1993 年。要是根据当时西方人对香港的看法，那么，在此地成立人道组织“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”的决定，就实在不寻常。然而，我在中国当过几年学生，也在香港为无国界医生照顾过越南船民一年，我深信香港并不止这样。我察觉到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一些演变的迹象，一种更大的对外开放，以及或许因“回归祖国”日期渐近而来的、一种寻求国际肯定的渴望。

虽然在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行动中心对我这个想法起初有点怀疑，但他们仍然接受我的建议：“6 个月。我们给你 6 个月的时间，去拿一点实质的证据来证明成功的可能性。”

就是这样，我独个儿带着极有限的财政资源，在天气最温和的美丽秋季，重临香港，心里折腾着，不知从何入手。因为，在香港，“无国界医生”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名字。那时我天天都很忙，有太多的行政手续要办理。好心肠的人遇过很多，但是对于我的情况大都束手无策，爱莫能助。同一个难题不停在脑海中刺痛我：究竟要怎么办？要怎样做才能令每天擦身而过的人群知道无国界医生的存在？才能感动他们作出捐助？

我开始留意香港其他的非政府组织，又或称为“慈善团体”。我很不喜欢“慈善团体”这称号，更不喜欢他们筹款的手法。他们大多数都是透过一些“慈善舞会”去筹集金钱。这些名流绅士的社交集会，每位入席都可能收费数千港元。相对于有限的时间和成本，这些晚会能筹得的金钱很多。然而我最讨厌这种晚会，这种家长式的施与，毫不讲求意义、反省和觉悟，让有钱人心安理得。我想，如果我随波逐流，我将会愧对那些我们正在帮助的有需要人群、愧对那些正在前线奋斗的工作人员，尽管他们不需要看见，不需要知道我到底在搞什么！

问题就是这样：是否只要法律允许，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筹募经费？抑或筹款活动本身要传达一些信息？是否可以在生活安逸、少有关心地球另一端发生惨剧的社会大众之间，引起一些关注和同情？对我来说，这些问题的答案明显是肯定的。如果慈善舞会是唯一可以筹得善款的方法，那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我很想朴实地尝试另一种方法，一种有意义的、能带来反省、能进入香港社会并从中展开的一种运动。这才是我构想的计划，值得我付出全部精力的

计划。若要乞求施舍，让豪富们自我感觉良好，那我是敬谢不敏了。

我对普世团结的理想有所指望，即使在香港，最低限度我也要试试。我宁愿相信它不只是个纯粹西方的概念。相信大家都同意：任何社会都存在团结互助的思想。这在亚洲社会也许更根深蒂固。但这亚洲式的团结，很多人认为只能在家庭，或顶多于乡里之间存在。然而，普世团结——向大家不认识的，并非近邻，也没有任何文化或族类关系的人伸出援手，难道是不可想象的吗？这正是我所希望验证的。说我太天真或太理想也罢，可我宁愿保持这个信念。

于是，第一个策略上的重大决定：我们集中传播那些真正需要人道援助地区的消息，而绝不以任何“亚洲地区优先性”作考虑；另一方面，要坚守无国界医生的真我：率真和敢言。我们不会只谈中国的水灾，而且，我们不会粉饰言词，甜言蜜语，人云亦云。我们不是要讨人好感，而是要震撼人心。要冒险就冒险吧，我们一样要忠于自己。这样，我们很快便能够估计到成功的机会有多大。

基于以上的原则，从我们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到第一次大型行动，所有的信息都环绕非洲大陆的灾难及无国界医生在非洲的相应行动。第一次招募的医生和护士，我们将要把他们派到肯尼亚和苏丹。哎，说得太快说过了头……

幸好，无国界医生并不单单懂得敢言、反叛和率性而行，它还是一个经过 20 多年实践，稳固磨合而成的组织。这儿有医生、护士、公共卫生及危机应变专家等。简言之，这许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全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动员起来。

就是这专业精神和率真冲动，使无国界医生一直吸引着我；这也是我不断努力向香港公众推介的无国界医生特色。

在缺乏财政支援的情况下，能够试验我想法的唯一途径，似乎便只有尽量加强和传媒的联系。如果记者们都愿意报道我们的消息，我想，我们还有希望透过他们获得公众的认识和支持；否则，我们既不愿意采用“筹款舞会”等孤立行动，成功的机会就等于零。当我接触此地认识的唯一一名记者——曾为《南华早报》采访越南船民营新闻的麦菲娜（Fiona MacMahon），我的运气来了。她一口答应帮助我，而且还放弃了她的记者职位。最初她以义工身份帮助无国界医生，后来当行动中心确信事有可为，她便成为第一个受聘于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的职员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草创时期的艰苦岁月。遇上紧急事故，我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也没有周末。

办事处正式开幕之前，我们已借着非洲布隆迪发生的紧急事故，在外国记者会（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）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并趁机宣布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成立。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号召，令与会记者大感惊讶。这呼吁后来在中文报刊广为传播。终于收到了第一个参与医生——宋法德的联络。宋法德原籍菲律宾，但一直都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。他执行任务的地点是在肯尼亚，环绕图尔卡纳湖一带。他亲切、认真、随时效劳的精神，使这第一次的经验获得成功，而且还取得行动中心对我们的信任：香港是可以给前线派出优秀的志愿工作者的！

护士吴淑仪在九龙区工作，听到了关于宋法德的冒险经历。她成为我们派往肯尼亚的第一个护士，到索马里边境的难民营服务。往后至胡立辉和邝志强。作为医生，他们被派驻南苏丹地区，与一些他们不认识的疾病作战。

这些早期的人际体验，是我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草创期间感受到的最大喜悦。这些年轻医生、护士经历的转变，可从他们的书信和照片中看得出来。透过他们的话语，我们猜测到他们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改善；他们的愉悦本身就使我们投放的精力物有所值。

期间，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于 1994 年 6 月正式开幕。为引起注意，我们选择举办一个“危困中的人群 Populations in Danger”图片展览。得太古广场免费借出场地一个星期；本身对无国界医生组织有认识，并且一直很支持这人道组织的港督彭定康先生（Chris Patten）亦接受我们邀请为开幕礼致词；广告及出版界著名的 McCann Erickson 广告公司，更主动为我们设

计出第一份小册子和通讯。忽然间，一切就上了轨道，提供协助的建议四面八方而来，好像超速运行的机器。当时我最大的忧虑，是怎样跟不上这意料之外的发展。尤其是在开幕之际，彭定康先生宣布香港政府给予我们一笔可观的资助，到中国南部洪水灾区去救助失去家园的人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接受中文电台的普通话访问，还不得不仓皇地翻查法中字典：“Inondation” = 洪水 = “eau-rouge”（红水），很容易吧！这令人惊心动魄，但又诚心喜悦。

数日之后，麦菲娜、我，还有新加入的 Katie de Tilly 的激动情绪才刚平复，卢旺达首批难民就穿越扎伊尔（今刚果民主共和国）边界，向小城戈马前进，随即爆发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灾难。数日之内，在这些匆匆搭建、没有最起码卫生设施的难民营里，霍乱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亡。国际援助只有点点滴滴，杯水车薪。

给我们初成立的岁月增添色彩的机遇之一，就这样出现了：晚上 11 时，准备以戈马的人间惨剧作为翌日头条新闻的《南华早报》记者，遍访香港所有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，只能找到我一个人。就这样，翌晨报纸的头条大标题刊登了我们刚开的银行户口号码；于是，我们仅有一部电脑和一条电话线的办公室，就简直成了援助建议（特别是捐款）的热线了。

为巩固这跨越种族、地域的团结，将香港和卢旺达扣上了的联系加强，我决定用这些筹得的金钱，去组织从香港直达戈马的救援行动。于是，我联络上 Peter Sutch，国泰航空公司的主席。我对他稍有认识，是因为约 10 年前我到英国游览的时候，他妈妈让我搭了便车，更收容我留宿了 2 个月。2 小时后，Peter Sutch 答应让我用一架波音 747 的货机，一个星期后出发。然而，应该让货机在哪儿着陆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。戈马有个很小的军用机场，但肯定容不下一架波音 747 货机。基加利？国泰航空的保险公司警告我们，基加利的机场跑道满布炮轰的弹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保险公司是不会受保的。经过数天的研究和讨论，我们选定了乌干达南部的一个城市：恩德培（Entebbe）。有关这班航机的消息传遍了国泰航空公司，机师们分毫不收；而全公司上下，都拿我们这两个年轻的、不懂分辨波音 707 和波音 747 飞机的无国界医生女郎来取笑。

现在余下要做的就是将紧急救援物资填满这架飞机。我们用布鲁塞尔行动中心开出来的清单做基础，再根据价格，在香港购买比布鲁塞尔要便宜的物资，终于将货机 70 吨的可载重量用尽。其中最特别的是：开始逐步撤离香港的英国军方，送出了五辆拥有储水罐槽设施的多用途越野车，可在小路行走运送饮用水。在霍乱疫区，饮用水的运送是对抗病疫的关键事项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运送了药物、被褥、肥皂……

就这样，在 1994 年 8 月 6 日启德机场的停机坪开记者会，我重返飞机的驾驶员座舱，还在为我们的行动而发呆。往恩德培的旅途，我们乘搭了 CX8999 班机，是国泰航空公司特意为我们安排的幸运号码。为确保从香港来的救援物资顺利抵达，我在当地逗留了一个月，同时照顾难民营里的孤儿。这个月的经历深刻地震撼了我个人的生命。这次旅程，借着它在传媒中引起的反响，也成为无国界医生进入香港社会强而有力的跳板，它使我们一下子得到了名气（当然仍是有限的名气）、信誉、做事快速有效率的形象。

我谨将此文献给 Peter Perowne，感谢他在背后默默地、无条件地支持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，感谢他常常给予我们确切的意见和鼓励。我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被时间冲淡，也不会因为分隔两地而耗损的。

同样，我想在这儿感谢以下的人们：Peter Sutch，很可惜他在今年离世了；David Tang，他优秀不绝的创意让我们前进；当然，还有麦菲娜、Katie de Tilly、宋法德、吴淑仪、胡立辉和邝志强等，他们陪伴我开始这个艰难而美妙的历险。他们中许多人与无国界医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。

2002 年春

狄安丽 (Anne Decortis)

项目主管

我是比利时人，持翻译系（英文、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）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曾在北京语言学院修习普通话两年。

1991~1992 年，我在香港担任无国界医生于香港越南船民援助计划的项目主管。1992 年策划成立香港办事处，进行筹款及招募志愿人员。4 年后返回比利时定居。1997 年出任“公民网络 (Citizens Network)”干事，这个非政府组织在海地及卢旺达推行有关公平及人权的计划。在卢旺达、海地及危地马拉参与短期任务中，我了解到人道灾难的受害者，对公平的渴求与对 人道援助的需要同样迫切，遂于 1996 年重返大学修读法律。现为比利时大律师，专长于刑法。